第一章

走出荆楚大地

东 渡 扶 桑

在中国湖北中部有一个古老的县—潜江(今潜江市),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地方就有了历史记载，原属于楚国章华和竟陵。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式用现名,建县城于豆子湖,隶属湖北路江陵府。民国二年潜江属襄阳道， 1926年改为省辖县。

潜江地处江汉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是我国主要的商品粮棉产区。西靠近长江；汉江从县内北边日夜不息地流过，汉江的支流东荆河纵横东部县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楚文化的熏陶下，这儿人才辈出，仅在近代就涌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傅慈祥、刘静庵等。

本书的主人翁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位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烈士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李人杰。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阴历三月初十。他的家乡湖北潜江坨埠垸（今潜江杨市袁桥乡）虽是我国中部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优越的地理环境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温饱，稍有天灾，广大的农民就四处逃荒。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李金山（1844—1919，字凤亭、晚年别号老迂）从小刻苦用功，尤善书法，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长大后走上了传统的科举道路，但屡试均落第，直到 38 岁才中了秀才。为了谋生，他在乡间或城关当上了塾师，过着清贫的生活。李金山正处在国势日衰的动荡年代，西方列强掀起了一阵阵瓜分中国的浪潮，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激起了包括李金山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忧患意识。他执教时，经常教育学生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掌握救国的本领，将来为国家效力。

李金山共有 7 个孩子(三男四女),长子书麟早丧。他将希望寄托在次子李书城和三子李汉俊身上。他以军事、工商业为富国强兵之道，训勉李书城习军事，李汉俊学工商业，“各成专材以备国家用’。[1]李金山的殷殷爱国之心，在李汉俊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根。

李书城对李汉俊的最初的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书城（1882—1965），字晓园，又名筱垣、小垣。在仕途中，李书城要比他父亲幸运得多。在 16 岁时，就中了秀才。那时他头上留着长辫子。也许是为了图个吉利，大人在他的辫子上扎了一根红绒线，所以乡邻们叫他是“红绒线辫子的小秀才”。1899年他离开了闭塞的家乡，来到省城武昌，入经心书院。这所由湖北开一代新风的张之洞创办的高等学府，开设了西方近代教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李书城的眼界。他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结识了革命党人吴禄贞[2]。

1902年李书城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初入东京弘信书院速成师范学习，后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那里他拜访了孙中山，结交了黄兴，开始投身革命。他和友人组织湖北同乡会，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后易名 《汉声》），宣传反清、爱国的民族思想。

1904 年，年仅 12 岁的李汉俊，在吴禄贞的资助下，也东渡扶桑。他留学日本不是孤立现象，是随着中国近代留学热潮而踏上了东方的岛国。中日两国传统友谊渊源流长，但到近代中日关系出现了奇特现象。在政治上，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国家。它在脱亚入欧时，走向了向外扩张的道路，中国首当其冲。日本这个不到中国 4%面积的弹丸小国，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天朝上国。但在文化上，中国竟出现了空前的留日热，大批的青年学生涌向扶桑之国。就在李汉俊到日本的这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就有近 5000 人，与李汉俊同赴日本的湖北留学生有 420 人。到 1906 年，留学热达到高潮，有上万学子东渡。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延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所习学科面之广，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为什么昔日留学生派遣国——日本会变成留学生教育国，而留学生教育国——中国却变成留学生派遣国呢？为什么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渡海到令中国蒙上奇耻大辱的敌对国——日本去拜师求知识呢？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商品和毒品砸开了中国腐朽的长城，使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894 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上下。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很快他们发现，中日的差距主要在学习西方的差距上。日本自“大化革新”以后，持续 1200 年左右时间的封建社会，到 19 世纪中叶，与中国一样，同样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凌，受到沦为殖民地社会的威胁。日本于 1868 年开始了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变革的运动，很快从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的国家。随着这个历史进程，日本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化书籍，几乎全方位的引进近代文化。

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

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文字同，其便一；地近，其便二；费省，其便三；有此三便，而又有当时维新之史，足为东洋未来国之前鉴。”[3]也就是说中国绝大多数留学生是抱着救国、强国的梦而负笈东渡，企图通过日本这座“桥”，去挽救面临瓜分危机的祖国，使它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本世纪初的留学热是中国人民进行救亡图存，将祖国建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正是这股强劲的世纪潮，将他与许多热血青少年送到了一衣带水的邻国。在那里，李汉俊和李书城住在一起，耳濡目染，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他最初进入一个叫晓星的法国教会中学校读书，后入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1915 年 7 月，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这时他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住在东京牛込区白银町 33 番，先后由刘震新（湖北沔阳人）、言微（江苏常熟县人）作保证人。1918年 7 月 19 日毕业。从他在该校的成绩单看，他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三年各科的平均成绩分别为 69.8、69.1、67.8，毕业论文评点是 65 分。由此看来，他的心事不完全用在学习上。

事实也正是这样。他处在民族危机四伏的时代，他和他的中国同学，绝大多数是无法安心读书的。那时中国政潮波澜起伏，袁世凯复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段祺瑞政府的媚日卖国……这些都在中国留学生中掀起了一阵阵狂涛。如何救国成为他们首要思考的问题。要救国就要有救国的思想和主义，李汉俊正在苦苦地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

他成绩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日本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死板的考试方式的愤恨和抗争。他在《我的“考试毕业”观》（《星期评论》第 44 号，1920年 4 月 4 日）作了披露。日本考试，

只要第一、二次考试考得好，得到老师好的印象，那么以后的成绩就与前次的差不多。如果第一、二次考得不好，那么就永远也不要想得到好的成绩。他进帝国大学时的第一次考试，碰巧住地失火，将他的所有书籍笔记烧的干干净净，“于是此后成绩就受打击，发表底结果很坏。自此以后，就永远跳不出后二十名了。”

这时的日本正是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1912—1925）时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这一显著变化，一方面推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了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潜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以上两个原因在日本造成了东西文明的比较和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思想上，单纯的崇拜西方的热情明显衰退，同时，国粹主义也失去了根据。人们急迫寻找一种寻根于日本的社会与现实，树立独立的文明倾向愈来愈浓。在寻求新思想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传播形成了高潮。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1898 年 10 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改为“社会主义协会”），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山川均等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伴随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迅速得到传播。中国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也是通过日本这座“桥”而树立的。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施存统[4]等，均是从日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也不例外，他毅然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思想上超越了兄长李书城。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两个激进的青年，后来他们共同战斗在五四新文化战线上，成为我国思想界耀眼的新星。一个是戴季陶（1891—1949），原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又字季陶。因戴氏先祖出自安徽，后迁居浙江，他生于四川广汉，所以他自称自己是“蜀中野人”。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聪悟敏颖，有神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制目，但早年科举考试，却落第，使这位后来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人与科考生无缘。1903年他考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在学习期间，第一次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16岁时，到日本东京留学。这一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国同盟会。他初入师范学校，后转入日本大学，专攻法科。虽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后来的事，但很显然那时他已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感染。

1909年夏戴季陶归国，曾在苏州任职。半年后到上海，初在《上海日报》担任编辑,后就职《天铎报》,不久担任该报的主笔，同时他为同盟会员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撰稿。此时他开始用“天仇”的笔名写文章,表明他与腐朽的封建王朝实行彻底的决裂。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笔挟风雷，使其名声大振，也使《民铎报》成为“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的最具有影响的十三种报纸之一。1911年春，因鼓吹革命而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亡命日本。不久应好友雷铁崖（昭信）的邀请，到南洋，担任《光华日报》编辑。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立即赶到汉口，与革命军一起，参加了阳夏保卫战。后到上海，上海光复后，办《民权报》，鼓吹革命。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他被聘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直到孙中山先生逝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孙的身边。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出走日本，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仆仆于中日之间。

另一个同志是沈玄庐（1883—1928),名定一,字剑侯,别号玄庐。浙江萧山人，生于福建顺昌。早年入县学，为邑庠生，后用一万元得任云南广通县知县。1908年到日本，与中国同盟会接触频繁，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加上海光复、南京战役等。次年组织公民急进党。二次革

命失败后，遭通缉，亡命日本、新加坡等地。 1916 年浙江议会恢复，被选为省议会议长。护法战役失败后，到上海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

戴、沈在日本期间，或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日本大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思想上均曾倾向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在上海与李汉俊重聚时，很快找到了思想上的共同点，成为我国最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

李汉俊在日本是十分活跃的，他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倾向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他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的密切注意，派人加以监视。这一点从日本警视厅总监的有关报告中可以得知。 1920 年 6 月，施存统到日本，经过戴季陶、李汉俊的介绍，认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和宫崎滔天等。1921 年 4 月，李汉俊也到日本，与施存统一道，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起，拟发行秘密出版物，并且协商出传递出版物的办法。他的行踪不明，日本警视厅派人对他“给予严密监视，并继续进行暗中侦察。”[5]

确立救国的道路

1918 年岁末的一天，李汉俊乘船回国，当褐色的海岸线出现在他眼前时，一个埋藏在心底很久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祖国！中国！故乡！”他扶了扶眼镜架，与同伴们情不自禁欢呼起来。

李汉俊回到上海后，初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对面的渔阳里（今淮海中路 567 弄）内。在那里他与同邑友人詹大悲为邻居。这位老乡比李汉俊长 5 岁，有着非凡的经历。詹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1887 年 8 月 3 日出生于湖北蕲春。1907 年投考湖北黄州府中学堂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与宛思演、梅宝玑等组织证人学会，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1908年到汉口办报。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后将报名改为《大江报》。与此同时，他参加革命团体文学社，担任文书部长。1911年7月26日，他在《大江报》上刊登署名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大江报》案使他名声大噪，一时成为全国新闻人物。

辛亥武昌首义，他被迎出狱，立即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汉口失守后，东走九江、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14年在日本成为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成员。1915年回国，准备回湖北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不幸在上海被捕。袁世凯死后，才获释。以后到广州参加护法。护法运动屡屡受挫，他来到上海，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正当这时他结识了李汉俊。他与这位新识的小同乡一见如故，俩人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1919年初春，董必武、张国恩[6]从鄂西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会。詹大悲与他们是多年并肩战友，特别是与董必武为莫逆之交。他们早在辛亥武昌首义时，就结识于江汉。起义爆发后，董必武激动万分从偏远的家乡赶到省城，投身革命，参加了汉口保卫战。这时他与詹大悲认识，从此他们并肩战斗。詹大悲立即将新识的朋友介绍给董、张。李汉俊很快成为他们的思想中心，尤其对董必武来讲至关重要，他的思想完全受这位比自己小4岁的年轻人的支配，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董必武，名贤琮，15岁时改名用威，号璧伍；“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时，用号的谐音。他于1886年3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与李汉俊一样，他生活在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的家庭里，所不同的是，他受到传统儒学的教育要比李

汉俊深得多。17 岁时就中考，但风雨如磐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做官”的仕途走下去，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时，他毅然割掉了辫子，参加了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民国初，他为了民主共和，二次入狱，二次亡命日本。1918 年到鄂西，担任鄂西靖国军秘书，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次年春，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遇害，到上海向孙中山求援，请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然而“孑然无助”的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也是无能为力。

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从秘密反袁军事行动到公开的护法战役，一次次的流血拚搏，一次次的惨痛失败，使董必武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之中。他开始认识到旧路——孙中山的依靠军阀打军阀是绝路，革命要从头来。新路在何方？

李汉俊成了他的指路人。他们这四个湖北佬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良策。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同乡。董必武等虽然一时看不甚懂，但他们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是清贫的，詹大悲将自己衣服和蚊帐也拿出去典当，与董必武共穿一件长衫，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心一意地读书，领略其中精义。

他们在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革命之路如何走？他们经常商量这件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董必武与张国恩初步的想法是回到武汉办一份为人民说话的报纸，拟定报名为《江汉日报》。1919 年 8月，董拿着孙中山先生给的 100 元川资回到家乡，用其中的 40 元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等，积极筹募基金。后因筹款困难，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和张国恩又准备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以

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报国愿望屡受挫折。忧思国维的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办法的焦虑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于是他写信给李汉俊，述说这种心情 。

10 月 6 日，李汉俊写了一封长 1.5 余万字的回函，阐述了他对改造社会的意见。这封长信后来标上《改造要全部改造》的标题，发表在《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6 号（1920 年 1 月）上，杂志社加了编者按：“ 这篇本来是李君答朋友的一封信，因为这个问题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李君答应本社拿来发表……我们希望社会上对于这个问题，加多一点注意，来研究解答他。 ”对于社会改造根本之途，由于信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李汉俊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来剖析。

首先试图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寻找造成黑暗社会的病根。他认为人的本性、自然性原本是透明的，虚无的，所谓善与恶都是不合理的环境造成的，从而使人类社会生出许多“ 强者 ”(统治者)、“ 圣人 ”。他们制造出制度、道德、法律，设下束缚人思想的种种圈套，破坏人的本性、自然性，禁锢人们的思想，生出了许多罪恶。他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因为思想没有解放，不敢怀疑，冲破统治者设下的圈套。而欧洲宗教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推动欧洲、日本社会产生巨大的进步，就是因为敢于怀疑传统思想，敢于突破思想上的种种圈套，因此中国必须开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冲破“ 如铁似茧重重包围的环境 ”,社会才能“ 进化 ”。

其次论述了制度、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李汉俊用架子、架子内的网和网上糊的壁（墙）来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都是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思想的圈套，制度好比是用几根木柱甚或铁柱结构起来的一个架子，道德是维护制度的，好比是用竹片甚或

铁棍在那个柱子的架子上面做成的网子。法律是补充道德之不足，好比是在那网子上，用纸糊成的壁，或者用泥甚或用三合土泥成的墙。这三者之间，道德是支配一切的，所以千百年来，统治者不断加固这个架子，最后使这个架子变成“无点空隙的死牢”。中国要进化，就必须冲出这个死牢。

再次赋予老子学说以时代的涵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儒家的道德观，他猛烈攻击孔学，指出现在北京政府非常崇拜、信仰、遵奉孔丘的学说，北洋政府的大小官员无一个不是孔丘的孙弟子，是活孔丘；中国要进化，就必须铲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与孔丘的旧道德相对立的是老子学说。他心目中的老子学说，已经有了新的内容。老子的无为是与孔丘的有为相对抗的，孔丘的有为是叫人作官，灭绝人的本性、自然性，而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叫人不作事，而是主张人去大奋斗、大拼命、大为的。中国人应该发扬这种无为的精神。

最后批评了各种错误的救国之途，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之途。五四运动以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围绕着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对社会改造的道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有相当的市场。李汉俊重点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对于调和主义，他指出调和本是英国政治家用的一个词，调和是用在性质相同，不过质量有点轻重，颜色有点浓淡的东西里面的。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背景、价值观、社会性质均不同，而中国的调和者则看不到这些，用英国进化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行不通的。通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说明中国不能实行调和主义，只能革命。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造、大破坏!! !大 建 设 !!!”

通过李汉俊这个中介，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曾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7]从此，他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诀别，成为“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 1919—1920 年的中国思想界，李汉俊代表了最先进的立场。他不仅在友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地在报刊上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他的第一件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参加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工作。

《星期评论》是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于 1919 年 6 月 8 日在上海创办的。它是我国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第一家革命刊物。这在它的宗旨中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五四、六五两大运动而起的人类运动。”它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的态度，公开宣称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对于“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都要进行“彻底的思索”。将自己“切实的主张”发表出来，“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李汉俊是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何时参加《星期评论》社的工作，目前难以考查出准确的时间。 1919 年 8 月 17 日，他就以“先进”的笔名开始在该刊第 11 号上发表文章，从文章的语气和文章的数量上（例如第 11 号上他就发表了两篇文章），可以断定他不得迟于 8 月 17 日成为该刊编辑。大致在这个时间，《星期评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标志是第 10 号（8 月 10 日）上发表恩格斯起草的爱尔福特宣言和第 11 号（8 月 17 日)上发表李汉俊的《怎么样进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决非

偶然。1920 年 2 月，《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 5 号搬到法租界白尔路（今西门路）三益里 17 号李汉俊的寓所。从此，他就成为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8]。

《星期评论》在五四时期的影响是巨大的。问世后，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震动，引起了思想舆论界的密切注视。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均刊登了出版消息。《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1920 年 1 月 1 日）上，称颂它是“最有力的周刊”。《新教育》第 5 期（1919 年 11 月）称赞它与《每周评论》是我国“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它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销数从最初的 1000 份，逐月增加，一度销售十几万份。许多进步团体将《星期评论》列为向广大青年推荐的主要杂志之一。武昌利群书社、北京、天津中华书局、杭州教育潮社、长沙体育周刊社等均为之推销。浙江第一师范共有师生 400 余人，订阅《星期评论》便有 400 余份，几乎人手一本。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报刊，盛赞《星期评论》是我国宣传进步思想最有力量的刊物之一，其中一部分人曾受到它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立三后来曾指出：在五四时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刊物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9]。1946 年夏，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自己的经历（见《瞭望》周刊，1984 年第 2 期），时，指出《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是进步刊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此外恽代英、俞秀松、施存统、杨之华等人的文章、回忆录、书信都忠实记录着《星期评论》在他们思想演变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在《星期评论》社周围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 年 3 月，施存统与一个浙江青年从北京抵达上海，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星期评论》社的工作。这位青年原名俞

寿松(1899—1938)，字柏青，后名秀松。他早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在《星期评论》社工作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担任第一任书记。施存统也是从这里出发到日本，并在那里建立起中共东京小组。

《星期评论》社还是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与外国社会主义者和同情中国革命的友好人士的联络点。五四运动后的第一个秋天，宫崎龙介（1892—1971）来到上海。他是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寅藏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宫崎龙介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者。他是李汉俊、戴季陶的日本知音,到中国后,立即到《星期评论》社，与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

9 月 22 日,李汉俊陪他到莫利爱路 29号(今香山路 7 号),造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很高兴地接待来访者，在客厅里与他们交谈。李汉俊问孙中山先生：“先生，中国革命会成功吗？”孙中山皱着眉，摇摇头说：“希望都破灭了，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以前的方针政策从总体上讲是错误的。南方派的人物如今都开始了反省和思考，反省才有进步。幼稚的日本政治家们如果多反省一点，东亚问题就不会那么多纠缠不清了吧？”

随后宫崎谈到南北和议的问题，他问北京政府派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到上海来的目的。孙中山先生说：“昨日，他来过，说是要恢复旧国会和扩充国会的权限，真是好笑。”说毕情不自禁的大笑起来。

他们笑这位所谓的议和总代表还有一个小插曲。王来上海时，带了 300 个随从和 300 万元的活动经费。上海各界却不欢迎他的到来，女学生团体发表了要杀死王代表的激烈言论，吓得他的随从们胆颤心惊，四处躲藏，最后竟丢下议和代表逃回北京。300 万

元对王揖唐的尴尬处境也丝毫没有什么帮助，他到孙中山先生寓所拜访时，被门卫“宰”了十几元钱的事，着实让孙中山先生的僚友们大笑了一番。

过了几天，宫崎到李汉俊家，与上海学生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见面，詹大悲也赶来。他们一起“肆无忌惮、高谈阔论地议论通向未来理想的中国社会的道路”，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李汉俊对中国最近的局势很不满，主张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宫崎先生回国后，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寄自新装的民国》，发表在日本《解放》杂志第 1卷第 7号（1919 年 12 月）上，留下了这段十分珍贵的史料。他一生致力于日中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访华。

李汉俊与戴季陶等在《星期评论》社还接待过其他日本朋友和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与《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取得联系，商谈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星期评论》在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的共同努力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毫不逊色于《新青年》1920年 6 月 6 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迫害下，被迫停刊。他们在此期间还共同参加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然而他们的政治归宿却迥然不同。戴季陶刚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的筹备工作，就立即退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创立了“戴季陶主义”，疯狂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成为蒋介石的理论家。

戴季陶现象是值得历史工作者去研究的，为什么一个在五四时期，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在我国第一个提倡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并将自己的寓所渔阳里 6 号提供

给中共，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上海外国语学社）所在地的人，五六年后，就“系统”地反对起马克思主义，变成被国民党称赞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 1949年2月12日，在大陆解放前夕，他终于对中国国民党和他的把兄弟蒋介石彻底绝望了，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上，沈玄庐比戴季陶要坚决一点，他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党员。 1925年5月，因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被中共开除党籍，随后成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在浙江参加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清党”活动。 1928年8月28日，被国民党系统的人刺杀身亡。

李汉俊和李大钊等形成了中国最先进的社会角色群体，在五四时期，通过革命的实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他们的勇敢、热情和智慧，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宣传新文明，让来自莱茵河一泰晤士河畔的马克思主义鲜花，在产生过灿烂华夏文明的古国吐芳飘香。

他处在‘荆天棘地之间’”[10]寻求救国道路，深知前景险恶，但毫不畏惧，勇敢地踏上了艰难而又坎坷的征途。

注　　释

1 甘云鹏：《潜江李府君墓表》，见《潜江庐类稿》卷61。

2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早年入新军，1899年进日本士官学校，同年参加兴中会，后又参加华兴会。 1910年任新军第六统制。1911年密谋反清，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杀害。

3 《日本游学指南》，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48页。

4 施存统（1899—1970），又名复亮，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早年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次年4月参加上海《星期评论》社的工作，不久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东渡日本，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1921年底回国后，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团中央书记部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会副主任委员。1970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5 《日本警视厅总监致外务省亚洲局局长》，1921年4月23日，日本外秘乙第523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6 张国恩（1880—1940），字眉宣（梅先、梅轩）。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共进会。1911年参加了辛亥武昌首义，1914年与董必武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8月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民政厅厅长等职。1940年在南京病死。

7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370页。

8 《杨之华的回忆》（1956年9月），《“一大”前后》（二），第25页。

9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

10 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1920年1月1日《建设》第1卷第6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